

本书主要学术观点

本书着重阐述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及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发展。

其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为儿童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提出中国儿童文学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二、提出中国儿童文学的两个“现代”说，揭示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三、阐述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理论的现代性、超前性和当代意义。

此外，还分析阐述了周作人、鲁迅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形成中的作用及彼此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价值的五个坐标。

这是一部视野开阔，资料翔实，注重实证，充满学术激情的开拓性著作。

目录

绪论 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4

一、理解现代化/4

1.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4

2. 现代化是人类的普遍文明/6

二、(西方) 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8

1. 现代化与儿童的发现/8

2. (西方) 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17

三、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4

1. 中国儿童文学与“外源型”现代化/24

2.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教育/32

3. 中国儿童文学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作为/35

4.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坐标/38

第一章 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论/45

一、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45

二、古代传统文学中的儿童形象/51

三、古代的儿童读物/58

四、传统的现代转化/66

第二章 晚清：中国儿童文学的受动性发蒙/83

一、晚清翻译中的儿童文学潜流/84

二、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97

三、《童话》丛书：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108

四、“童话”词源考：中国儿童文学受动性旁证/114

第三章 五四：建设主体性的“现代”/124

一、儿童文学：五四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25

二、“儿童本位”：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原点/130

三、白话文：儿童文学的文体创造/140
四、《稻草人》：创作的现代性起点/146
五、两个“现代”：理论与创作的错位/151
第四章 周作人：中国儿童文学的普罗米修斯/171
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的儿童观比较/172
二、“本能的缪斯”：周作人的儿童心性/189
三、周作人与西方的“现代”/206
四、主体的现代性/223
第五章 新中国八年：教育工具主义的时代/244
一、短暂的“黄金时代”/244
二、两只公鸡与三只猫：儿童观的倾斜/255
三、样本检验：张天翼童话论/270
第六章 新时期：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287
一、社会现代化的驱动力/287
二、“儿童文学是文学”：向文学性回归/290
三、“儿童的文学”：向儿童性回归/303
四、跨世纪的现代性追求/326
结语“解放儿童的文学”：新世纪的儿童文学观/343
一、“解放儿童的文学”——并质疑“规范”论/344
二、“教育成人的文学”——儿童文学的人文关怀/349
主要参考文献/356
附录/359
后记/365

绪论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一、理解现代化

1.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

作为历史的常识，谁都知道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样三个阶段。现代化是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被创造出的人类文明。虽然有人提出了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但是，作为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化仍然正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可以说，即使是首创了现代化的西方诸发达国家，也依然置身于现代社会之中，行进在现代化的路途之上。

我们所关心的是现代化何以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东方。

首先，我们看看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中国。其实宏观人类世界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给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社会带来现代化变革的三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已经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其源流。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以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中国。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只产生了作为现代社会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早在这萌芽还未成熟之前，西方已经率先开始现代化，步入了现代社会。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西方社会伴随武力的现代化传播，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也会自发地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不过，这只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假设。但是，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面对它，任何假设都毫无意义。即使历史含藏许多偶然性，我们也只能接

受这一次性的历史事实：在西方社会创造了现代化这一人类的崭新文明时，中国还处于落后的封建社会之中。

至1840年古老封闭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野蛮地打开门户为止，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一直没能生成创造现代化的伟力。中国的儒学教人以圣人君子之道，而圣人君子的模范为尧、舜和孔夫子。完美的人格存在于历史上最早的统治者之中，绝对真理存在于儒学创始人的阐释之中，这一信仰是儒学成立的大前提。因此，所谓治学便是跪拜于那些圣人君子的教诲面前，只知道听从其垂训，于是训诂注释便成了中国的传统学问。虽然儒学的始祖建立了划时代的独创思想，但是后继者们，即使具有独创才能的人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得施展其独特的创造才能。学问的进步，至多不过是训诂注释的方法的进步，即仅止于解释圣贤之言的新方法的探求。中国录用官吏的考试制度科举，从形式上可以说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现代化”考试制度，因为它采取自由竞争、公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材。但是，其最为关键的考试内容却只是背诵和掌握儒学的典籍，撰写禁锢思想的八股文，终于没能从内部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从而改变传统中国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

再看看日本。在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在日本封建社会母胎内已经出现了瓦解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苗头。从“问屋制家内工业”到手工工场，日本的商家逐渐努力强大起来。但是，江户时代的商家一味强调突出创业者的功绩，后代子孙陷于遵循家训、守护遗产的保守心态之中，冒险和革新精神均被排斥。当然，商家的创业者是革新人物，但是子孙们却反而被创业者的传统所压制，即使他们具有革新的才能，墨守祖法的思想也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其结果便是竞争遭到排斥，技术革新的念头得不到鼓励和刺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难以从江户时代产

生。

事实上，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现代以前的社会都被束缚于传统之中。西方的中世纪也是封建社会，虽然西方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高度集权，但是，由于封建领主制与天主教会结合在一起，而天主教会是以教皇为首的一元化组织，所以，中世纪的西方依然能够保持其统一性。在中世纪的西方，革新也是不被允许的。布鲁诺提出日心说时，由宗教裁判后被烧死就是尽人皆知的一例。

但是，西方与中国、日本所根本不同的是，它不仅从自身内部即基督教内部生成了宗教改革的力量，而且还凭自己的力量创立了现代科学，从而摆脱了非合理的传统的束缚，奠定了科学精神这一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如今现代化的内涵已有许多学者给出清晰的界定，那就是经济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经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核家族、都市化、自由、平等，文化领域的实证科学、合理主义。从构成现代化的这些领域的成果来看，它们基本上是由西方首先创造出来的。即是说，现代化不是多起源的历史现象，而是单一起源的历史现象。^①

2. 现代化是人类的普遍文明

虽然，现代化是由西方首先创造出来的，现代化是一种单一起源的历史现象，但是，现代化却不是西方的专有文明。

西方国家在产业革命完成以前，由于地理上的大发现，从美洲大陆获取金银，从亚洲和非洲获取香料、糖甚至奴隶，得到了巨大利益。在殖民主义的阶段，西方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完全采取一种征服、破坏和掠夺的方式。而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性质发生了变化，其贸易目的主要是从后进国家进口加工用原料，然后再向后进国家出口工业制

品。于是西方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只是单方面的征服、破坏和掠夺，而是还需要通过移民与殖民地保持长久关系。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在第二阶段同样是双手有着血腥的，殖民主义者不仅不平等地残酷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殖民竞争还促使军国主义复活。不过在这个阶段，西方先进国家也向后进国家传播了西方的现代化文明。

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当然存在着这一国家的内在要求，但是，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的启动大多主要由于外在要求。所以，后进国家依靠西方传播来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在最初阶段是受动的，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即使转为能动的，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和经验。

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肯定要包含模仿的要素，但是，文化传播不可能像复印机一样，将西方的现代化全盘复印到后进国家的版图上。后进国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着复杂的、有机的先在结构。西方的现代化这一文化的传播，对后进国家来说，必然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现代化传播中如何选择性地接受西方的现代化；二是如何使自己的体质适应所接受的西方的现代化。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本身应具有创造力。

可以说，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特殊国情，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现代化，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作为人类的普遍文明，并非就是西方化。从历史来看，后进国家在社会性质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现代化类型。一种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比如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另一种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目前，中国建设的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制度分离的社会性质转换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现代化是人类的普遍文明，就抹杀社会制度的差异也是错误的。其实应该说，正是因为每个国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殊国情，选择与西方不尽相同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才可能成为全人类的文明。

尽管现代化以不同的实现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通文明，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走向这一文明，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也并非一路花红柳绿。现代化固然神话般地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但是，它在这一过程中也给人类带来了负面的价值，比如，资源的超前消费、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物质主义对心灵田园的践踏等。这些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由作为系铃人的现代化自己来解决，人类的危机将会到来。

二、（西方）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1. 现代化与儿童的发现

我所以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最初的契机是因为我发现（也许说意识到更妥当），在历史上，不仅儿童文学与现代化一样起源于西方，而且，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

儿童文学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儿童文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以前没能产生，其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所有形态的社会都没有“发现”儿童。

儿童是一个历史概念。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人，儿童的身上具有儿童特有的心理、感觉和情感，对此，成年人必须给以理解和尊重，这种关于儿童的观念，在今天几乎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儿童观只不过萌生于两百多年前，而它真正在成人社会占据普遍的支配地位，恐怕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60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斯出版了震动西方史学界的著作《“儿童”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阿利斯指出，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并不承认儿童具有与大人相对不同的独立性，而是把儿童作为缩小的成人来看待，人们只承认短暂的幼儿期的特殊性，要求儿童尽早和成人一起进行劳动和游戏，这样，儿童便从小孩子一下子成了年轻的（虚假的）大人。“中世纪没有儿童”、“中世纪没有儿童时代”是这部著作的一个观点。对此，阿利斯在书中作了细致的实证。阿利斯的一个独创方法是通过艺术品如绘画来说明问题。“几乎到十七世纪为止的中世纪艺术，既不承认儿童，也没有尝试去描画儿童。中世纪艺术中儿童不在的状况并非是由于技巧和才力不足，而是因为并未在这个领域中给儿童期以一席之地。”

②

与阿利斯的《“儿童”的诞生》一样，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鲍斯特曼于1982年出版的《儿童的消逝——对教育和文化的警告》也是有着独到发现和见解的著作。鲍斯特曼认为儿童期与婴儿期不同，它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而是社会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儿童期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并不存在，鲍斯特曼认为原因来自成人社会的缺乏读写能力，没有教育观念，没有羞耻心。鲍斯特曼承认生活困苦、儿童生存率低也是一个原因。鲍斯特曼列举了其他学者指出的许多事实来说明中世纪没有儿童这一观点：十四世纪以前，儿童没有在遗嘱中出现过；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死亡儿童的性别没有任何记录；到十六世纪末，夭折的儿童的名字才多少得以出现在墓碑上；十六世纪以前，没有育儿书和儿科医学书；几乎没有描写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书籍；没有儿童参加葬礼；在文学中，儿童的主要角色一般是被溺死、掐死或被扔掉；绘画中儿童被画成小大人，穿着与大人同样的衣着；儿童使用与大人相同的语言；绝大多数儿童不能上学，他们离开家庭被人雇用做工或去当学徒。

在说明童年概念的产生原因时，鲍斯特曼本人很有创意地强调十五世纪中叶出现的印刷机所起的作用。他论述道：“很明显，要使儿童期这样的观念出现，则成人领域必须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不仅必须是极其重大的，还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必须是能够催生出明晰而崭新的成年期的东西。在中世纪里，有众多的社会变化、机械钟表那样的发明、黑死病等重大事件，却没有一件事情促使成人改变对成年期的看法。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这样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成人领域里对成年期的新的看法出现了。新的成年期将儿童清晰地排除在外。随着儿童从成人的领域被放逐，就需要发现儿童落脚的另一个领域，这另一个领域便作为儿童期为世人所知。”^③

活字印刷机是给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具体而深刻影响，也可以说是创造了现代化文明的三大发明之一。从鲍斯特曼的主张中，我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便以儿童期的发现为诞生的前提）与社会的现代化的直接联系。

日本学者砂田弘曾说：“尤其是在欧洲，印刷术发明后，圣书广泛普及，为扩大文学的读者圈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一段时期，堪称儿童文学的出版物并没有产生，这是因为产生儿童文学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没有给儿童文学的成立带来直接的影响。”^④

尽管砂田弘的观点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却不能不看到印刷机的出现，的确为日后儿童文学的出现创造了一系列条件。比如，印刷机促进了宗教改革，基督新教通过印刷机把宗教送到每一户的餐桌上，而不用依赖神职人员的解说，并由此打破了偶像崇拜。印刷机将口头声音语言变成眼睛阅读的语言，这就使阅读变成了纯粹个人的行为，从而营造了促成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的心理环境。而自我意识与个人主义都是童年概念产生

的温床。印刷机还造就了有知识的人群，他们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获得一种观念：儿童必须经过学习，进入书籍的世界，才能成为成人。于是，西方重新创立学校（中世纪的学校垄断在教会手中，而印刷机打破了这种垄断），正是学校给童年概念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接下来是一种连锁反应，正式的学校教育改变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成为儿童的监护人、管理人、品行的裁判者，家庭也担负教育功能和责任，于是儿童文学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现代家庭也渐渐形成。

如果沿着鲍斯特曼将社会现代化的具体形态与童年概念联系起来的思考方式走下去，我们还会遇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革命。有人说，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产业化，是形成童年概念的劲敌，因为工厂、矿山急需劳力，许多儿童成了童工。但是，产业革命是两刃剑，一方面，它夺去了大批儿童的童年，另一方面，它对经济发展的推进，带来了更为广泛的财产分配。在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异常迅速，就是国民通过产业革命，经济生活普遍提高的反映。

即使在产业革命期间，童年概念也并未受到根本的威胁，因为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保护了这个概念。在这样的家庭，儿童接受教育，穿着自己的新衣，拥有自己的房间，过着个人化的生活，他们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儿童文学也主要是存在于中产阶级的家庭里。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儿童概念的确立，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能力的改善和提高有密切关系的。

童年概念的发现与儿童的生存率也有关系。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英国的儿童生存率极低，因此不得不以多生育来保持人口平衡，生育十来个孩子而仅能养活一两个的家庭司空见惯。在朝不保夕这种状态下，父母对儿童当然不会产生面向未来的童年概念。改善这种状况的是十八世纪以后，科学进步下的妇产科和儿科的发达以及牛奶产量的大增和牛奶消毒工艺的运

用。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成果，使儿童期得以长期化，这就将成人从儿童死亡的恐怖中解放出来，有了容纳童年概念的心理空间。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家庭单位从传统的家长制家族，变为现代的核家族。家长制家族是一种统治性家庭结构，它突出的是父亲（也是丈夫）的支配地位。家长制家族向核家庭分裂的过程，意味着父亲（丈夫）的权威的衰退乃至消失。核家庭的成立，为改变父与子的从属关系，为家庭中的人格主义和民主关系的出现，奠定了现实基础，因此，也为童年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看到了进入现代以后，儿童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童年概念或者说儿童观是怎样变化的呢？

在西方，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问题往往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儿童观的变化，最初是由清教徒们引发的。在历史上，清教徒为推进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他们进行的宗教改革，实际上促进了教派分化，最后由各种信仰互相迁就到互相宽容直至通向宗教信仰自由。可以说，清教徒中的民主促进了社会的民主主义。在宗教意识上，清教徒坚信圣经关于人是容易受邪恶诱惑的，能从毁灭中得到拯救的只是极少数人的教导，他们严格审视自己的内心，渴望道德的完善，以证实自己将被拯救出来。清教徒将家庭也看作传教的圣堂，他们开始在家庭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这种宗教教育是禁欲主义的，它建立在基督教的原罪论之上。但是，与进行体罚的传统基督教的原罪决定论相比，进行心理惩罚的清教徒的儿童观则有了进步。表面看来十分严厉的清教徒家庭的禁欲式教育，其实反映了他们深信儿童具有陶冶的可能性，理由是，如果他们原样接受中世纪的原罪说，相信儿童的原罪是不可更改的话，其自我改革意识和对儿童的教育意识则不会如此之高，因为传统的

原罪说是不承认教育的可能性的。宗教改革以降，改革派内对道德的关心变得更加浓厚、深化，在这一背景下，清教徒对陶冶儿童的可能性的信赖感也增强了。以身处宽容的儿童教育正在流行的二十世纪的我们看来，表面显得严厉的清教徒的儿童教育，其动机也是由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对儿童的理性关爱所支撑着。但是，清教徒的这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制式地单方面塞给儿童的禁欲的侵入式的干涉，使长幼关系变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由于清教徒对儿童的内面生活的不理解，家长越是出于为孩子好的目的去教育儿童，儿童的内在生命力便越是受到压抑和窒息。

英国哲学家、教育思想家洛克于1693年出版的《关于教育的考察》一书，大大推进了人们对童年概念的认识。洛克认为，刚刚出生的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教育应该把这张白纸填满。教育的责任当然在成人身上，因此，一个无知的孩子代表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洛克把儿童看作珍贵的人的资源，这一观点显然是对清教主义的带有原罪色彩的儿童观的否定。洛克基于“白板”这一认识，对教育的估价很高，肯定教育在儿童的造就中能起决定作用，只要不让儿童接触迷信的和非合理的事物，儿童就会成长为健全的人。洛克虽然以独到的目光指出了儿童的精神与身体的紧密联系，但是，他所主张的教育仍然是偏重理性的教育：“我明确地意识到，所有美德和优越性的原理，都在于具有当理性不认可的时候，自己拒绝自身的欲望的满足这一力量。”^⑤洛克的“白板”说，不仅极大影响了十八世纪的儿童观，而且在二十世纪的儿童教育中也占有一定的市场。

在儿童发现的历史上，法国的卢梭是比洛克更加响亮的名字。许多学者在论述卢梭对于思想史和教育学史的意义和贡献时，都使用了“儿童的发现”一语，仿佛在说，“儿童的发现”始于卢梭。

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名教育著作《爱弥尔》称得上是儿童的福音书。这部人类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著作，为童年概念的革命提供了两大贡献。第一，卢梭明确指出，儿童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独自存在。卢梭重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性，认为儿童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儿童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儿童本身就是重要的，儿童时代决不只是迈向成人一个台阶，而是具有自身的价值，儿童代表着人的潜力的最完美的形式。与洛克只把儿童看作珍贵的人的资源相比，卢梭的思想具有根本的革命性。第二，卢梭提出了自然人的教育思想。《爱弥尔》开篇即曰：“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们手里，就全变坏了……”^⑥以此开始了对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异化成理性的人的社会和文明的批判。作为个人本性观上的性善论者，卢梭指出，正确的教育应该是使儿童的自然感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或者说是使儿童贴近他的自然感性状态。卢梭看到了完善儿童的自然感性在人的整个成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任何对自然感性的压抑和破坏都会使人失去存在的完整性。卢梭指出，这种对儿童自然感性的压抑和破坏来自理性：“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时髦不过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靠的；就我来说，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到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但是有些人还偏偏要用它去发展其他的官能哩！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⑦但是，“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我宁愿让一个孩子到十岁的时

候长得身高五尺而不愿他有什么判断的能力。事实上，这种年龄，理性对他有什么用处？”^⑧卢梭并非是反理性主义者，他只是深入思考着，为什么理性本应是使人达到健全状态的一种能力，却反而成了导致人类种种不幸的最大原因。卢梭说：“儿童时期就是理性的睡眠。”^⑨如果在儿童期，自然感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让儿童经验式、实验式地获得智能的教育，长大以后就能得到健全的理性。

洛克将儿童比喻成白纸，卢梭则将儿童看作自然中的植物。在洛克那里，成人将白纸填满，便是成熟；而卢梭所要做的是使儿童避免受到文明中病态东西的污染，有机地、自然地成长。

英国浪漫派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对浪漫主义先驱卢梭的儿童观中的一些观点产生了共鸣。与卢梭从教育的立场发现儿童不同，浪漫派诗人用文学来发现儿童。

十八世纪后半叶以降，以产业革命为发端的英国的社会变革，遮住了民众审视内心的一只眼睛，使他们只知盯住物质主义的生活（在这里，现代化暴露出了它的负面），而观照人类灵魂的文学艺术却遭到了轻视。在这样的状况下，浪漫派诗人用赞美纯真的儿童来反抗想用无机的物质主义涂改人性的社会潮流，因为儿童正是人类原初的感受性和想像力的象征和代表。

布莱克常常被看作反抗产业革命的诗人，其实与当时的工业社会本身相比，布莱克弹劾的更是造成工业主义、物质主义的机械化心灵。与被物质主义污染的都市生活的俗恶相对立，自然和儿童在布莱克的审美视野中被特写。正如诗集《天真之歌》所表现出的，布莱克将自然和儿童视为神圣，并注目于儿童身上表现出来的尊贵的基本人性。

华兹华斯在被认为是自传式诗歌的《序曲》中宣称，幼儿所具有的能力包含着与神相似的创造性和内宇宙，这种能力尽管随着长大而逐渐失去，但在生命结束之前还会有些留存。也就是说，儿童是人类的原型，成人不过是儿童的变化。华兹华

斯更在那首著名的诗歌《虹》中将儿童尊奉为成人之父——

我的心跳荡，每当我目睹
彩虹横贯天宇
我生命开始时，是这样
我长大成人了，是这样
但愿我老了，也还是这样
否则不如死去
婴孩本是成年人的父亲
因而今后的岁月，我可以希望
贯穿着对自然的虔敬

在华兹华斯的诗作中，自然与纯真的儿童时代，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儿童时代就像自然中横贯天宇的彩虹一样，是一个巨大的灵魂，是人性的根本。华兹华斯曾在诗中说自己是一个迷途者，但在朴素的儿童时代里找到了伟大的人性扎根的根基。

十八世纪末浪漫派诗人们尊崇儿童所具有的人性根本价值，把儿童作为生命和成长的象征这一儿童观，渐渐渗入到十九世纪的人们的意识之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确立，继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学说之后，给人类的自尊心以第三次沉重打击，因为他论证了人的行为主要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在二十世纪，人类几乎所有生存领域都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童年概念的发展也是如此。

布莱克早就在他的杰作《天堂和地狱的婚姻》中歌吟过：“力便是惟一的生命，力来自肉体……力是永恒的欢乐。”弗洛伊德则以他的研究确证：人是始终寻求快乐的动物。弗洛伊德对儿童时代是天真无邪的这一浪漫派诗人的主题进行了科学改造，他既不主张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也不认为这种返回能够做到，但是，他却指出，童年时代始终是人的不可摧毁的向

往。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心灵具有最佳的特有内涵和难以消除的构造，比如，儿童具有性的能力和本能的心理驱动力。儿童要想进入成熟的成年期，必须克服、摆脱本能的激情，而将其升华。儿童的自我和个性应由教育来保护；心理自制力要能够抑制精神和肉体的冲动；逻辑式思维要得到发展；关于生活的知识要置于成人的管理之下。但是，与此同时，儿童的独自的发展法则、情趣、好奇心和喜悦绝不能被扼杀，哪怕冒着失去成熟的成年期的危险，儿童也要拥有它们。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儿童的发现只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能完成，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

2. （西方）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儿童文学也是人类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伟大创造。儿童文学的成立是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的，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以儿童观的进步为动力的。如果儿童观的发生和进化是来自人类（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的催生和推进的话，那么儿童文学也同样是如此。

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接受了现代化的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恩惠。

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政治领域的民主主义思想，社会领域里的个人独立、自由、平等思想，当然也是儿童文学的思想基础，不过，作为现代精神成果的现代儿童观则给儿童文学以根本的影响。